

中国禁毒先驱唐国安

苏智良¹ 刘效红²

(1.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2.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上海通志馆, 上海 201201)

[关键词] 唐国安; 万国禁烟会; 禁烟

[摘要] 1909 年在上海召开的万国禁烟会, 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国际性的禁烟会议, 它首次确认了鸦片等毒品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禁止, 会议决议的内容多被以后的海牙禁烟公约所采纳, 成为国际社会反毒禁毒的普遍原则。唐国安, 这位留学生才俊, 是清廷选中参加上海万国禁烟会的中国代表之一。在会前, 他积极筹备会议事务, 在选择会址、核查各地禁烟实况等问题上费尽心思; 会上, 他以中国各地已取得的禁烟成绩为依据, 与其他国家与会代表展开辩论, 发表精彩演讲, 获得大会好评; 会后, 他仍不遗余力地投身于禁烟事业中, 将禁烟思想发扬光大, 进一步推进中国禁烟运动的发展与壮大, 是流芳千古的中国禁毒先驱。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10)01-0001-05

1909 年在上海外滩的汇中饭店 (今和平饭店南楼) 召开了万国禁烟会议, 这也是上海乃至近代中国举行的首次重要国际会议。会议的缘起是在华传教士目睹中国人民受鸦片危害之深, 向美国政府提出召开一次国际禁烟会议。时值美国政府在华推行“门户开放”政策, 为了排挤以鸦片贸易发家的英国而获得在华利益最大化, 并解决美国国内日益严重的鸦片问题, 遂采纳了在华传教士的建议, 向相关国家发出在华召开一次禁烟会议的倡议, 并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响应。该会原定于 1909 年 1 月 1 日在上海汇中饭店召开, 但由于 1908 年 11 月 14 日清朝皇帝光绪离奇去世, 次日, 慈禧太后也相继去世, 中国陷于国丧之中。为表示对中国的同情与慰问, 会议被推迟一个月。1909 年 2 月 1 日, 万国禁烟会议正式在上海拉开帷幕。会议上, 中国禁烟专员唐国安用流利的英语, 围绕着鸦片贸易的危害与中国禁烟取得的实效问题, 与英国代表展开激烈的争论, 他的努力得到了全场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唐国安这位传奇人物, 作为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的身份为众人所知, 但他作为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国际禁烟会议的禁烟专员和他对清末中国禁毒的贡献却很少有人知晓。下面就此展开阐述。

一、从留美幼童到清华第一任校长

唐国安, 字国祿, 号介臣, 1858 年 10 月 27 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唐家镇鸡山村 (今属珠海市), 这里是人才辈出的风水宝地,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洋行买办、清末洋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唐廷枢, 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唐绍仪也出生在这里。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的国门洞开, 沿海地区开始成为开放口岸, 其中, 广东便是鸦片战争之后最早开埠的地区之一。在这里, 人们最早接触到西方的文化, 并且为了便于交流, 民间流行“洋泾浜英语”。两次鸦片战争之后, 清廷再也不能自欺欺人、闭关锁国了, 围绕着战后赔款等问题, 清廷不得不与西方列强进行交涉。为了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 从 1872 年到 1875 年, 清政府先后遴选出四批官费留学生。儿时聪慧出众的唐国安, 经族叔唐廷枢推荐, 以第 36 名排序入选为第二批留美幼童。1873 年唐国安赴美, 在新不列颠中学就读; 之后由于品学兼优, 考入耶鲁大学法律系。在这所历史悠久的名校里, 他接受了世界上顶尖的高等教育, 学习国际上通用的法律知识。在刻苦勤奋学习的同时, 唐国安勤俭孝顺, 常省下公费资助他人, 有时还寄钱回国给母亲补贴家用。在美

[收稿日期] 2009-08-21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上海市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 (SJ0703) 规划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 苏智良, 男, 浙江嵊州人,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效红, 女, 山东潍坊人,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通志馆助理馆员。

国的刻苦学习,为他以后回国效力奠定了基础。

由于清政府颁布终止留学的政策,勒令留学生回国,1881年,未完成大学学业的唐国安,只能遗憾地踏上回国的路程。归国之后,他来到华洋杂处的上海任某校教员,由于教学成绩突出,被调到圣约翰书院(后发展为圣约翰大学)任教,与颜惠庆同事,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颜惠庆之父颜永京是早期留美学生,为上海著名牧师,曾参与圣约翰书院的创办,并任院长。他对鸦片深恶痛绝,曾经到英国国会抗议过鸦片贸易。颜惠庆受父亲影响,也主张禁毒。此后唐、颜两人一起为《南方报》开辟英文版,出任编辑,《南方报》面向旅居上海的外国人,每期发表社评一篇,由唐国安负责。他敢于对时弊直言正论,不畏权势,曾抨击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建的设施不利当地中国居民,所定的规章有悖法理,并将在耶鲁大学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中,为此几乎被逐出租界。但是他坚决不退让,表现出对同胞的一片热忱,被誉为国人“用英文自办日报的先驱,保障国权的楷模”。1900年,唐国安成为寰球中国学生会(欧美同学会的前身)的董事,负责中国留学生的相关事宜^[1]。在沪期间,唐国安认识了致力于世界禁毒的美国主教勃伦脱,了解到各国日益严峻的鸦片问题,从而对世界鸦片问题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他们还讨论了举行一次世界性禁毒会议的可行性。在上海,唐国安还与传教士以及教会合作,撰文、演说、宣传,进行了解决中国鸦片问题的尝试。

1887年,唐国安被调至京城,担任外务部司员,以后还兼管京奉铁路事务,曾参加禁止缠足社团的活动。1908年他被外交部派驻日本及澳门。此后,恰逢清廷筹建清华学堂,唐国安出任清华第一任校长,他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逐渐完善清华的教学制度,为中国的科技、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积极筹备万国禁烟会

唐国安在美国接受了6年的西方教育,因此思想较为开化,在反对生活陋习方面态度尤为坚决。1908年,传教士联名倡议,要求禁止鸦片。时任外务部候补主事的唐国安,与同为外交官的颜惠庆讨论如何禁绝鸦片,于是一起找勃伦脱主教商量举行禁烟大会,美国政府从而决定“约请东方有属地之法、德、英和日本等国政府各派专员考查鸦片情形”^[2],在上海召开禁烟会议,商讨禁烟事宜,世界近代史上首次禁烟会议也由此拉开

帷幕。

国际禁烟会议欲于沪上召开的消息传来,上至官府、下至百姓无不欢欣雀跃,全国性的禁烟运动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此之前,为开展禁烟运动,清政府已在京师设立禁烟总局,在上海设立禁烟总会,负责各省禁烟事宜。这些禁烟机构的设立与完善,使中央与地方的禁烟联为一体,从而为禁烟运动的推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08年初,清廷委派恭亲王溥伟、协办大学士鹿传霖、协办资政院事务景星、丁振铎担任禁烟大臣^[3],负责调查全国各地的禁烟情况。清政府还明令官员戒烟,以为民之表率。唐国安在上海参与禁烟的经历为他入选中国政府代表团起了促进作用。作为禁烟专员,他与直隶候补道刘玉麟、直隶补用道徐华清等与会人员一起筹备会议,并协助中国首席禁烟大臣端方处理禁烟会议的相关事宜。在会址的选择上,唐国安与其他几位会议代表颇费心思。抵沪之后,诸位代表在拜谒江海关税务司时,获悉海关有闲置房数间,可以用作会场,唐国安等人亲自到现场察看,认为此处“尚属可用,独无会议厅,将来各国会员到后恐不适用”^[4]。之后经过多番考察,认为外滩南京路交汇处的汇中饭店“房屋宽敞,楼高五层,大可选择”^[5]。因此,汇中饭店这个当年上海滩最豪华的宾馆,便成为首次国际禁烟会议的会址。

上海万国禁烟会之议决定后,清政府便派专员筹备会议中的相关事宜,其中,中国首席代表端方致电外务部,认为中国需作好三方面准备:禁种、禁吸和禁售^[5]。当时清政府已派专员调查各省的禁烟情形,并把禁烟成绩作为考察管理的政绩标准之一,但当时的禁烟工作仅仅限于调查,并未详加研究,因此,唐国安等代表不分昼夜,开始对各地禁烟局上报的禁烟资料深入研究,并逐一核实,颇费一番工夫。在此过程中,唐国安充分发挥了自己在语言上的优势,准备了大量的英文材料,这些材料成为他在会上陈述中国在禁烟方面已取得的成绩,并与英国与会代表展开激烈辩论的有力证据。

三、万国禁烟会上的突出贡献

1909年2月1日,首届万国禁烟会议在当时中国最开放和交通最便捷的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由两江总督端方率领,唐国安不仅是中国代表团专员,还担当代表团发言人的角色;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报告、答疑、质询、提案、演讲都由他承担,

他成为最活跃的会议代表。

唐国安凭借丰富的学识、经验和娴熟的英语,在会上流畅地回答英国代表的提问,评驳荷兰代表的提案,阐述医学在禁烟中的功能,还代表中国代表团向大会递交 4 条提案。为准备有关中国禁烟的英文资料,他废寝忘食,夜不能寐,以至于在 2 月 12 日第六次会议前积劳成疾,因病缺席。唐国安在大会上的卓越表现以及他严谨求实的态度,得到了与会各国代表的一致认可。对于唐国安的患病和缺席,大会主席勃伦脱特别发言,表示遗憾和慰问。

在大会上,主导鸦片输入入华的英国与会代表刻意回避英国国内的鸦片问题,但对于中国的鸦片问题却横加指责,认为中国代表向大会递交的有关中国国内罂粟种植亩数、吸烟人数、鸦片税收的数据是凭空编造的,没有事实根据,因此中国递交的报告没有任何价值。英国代表对中国代表团报告的质疑与挑衅,使得会议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对于英方的吹毛求疵,唐国安引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和中国海关报告中的具体数据进行了反驳,还以台湾为例进行典型分析。他的慷慨陈词让各国与会代表心服口服,让挑刺的英国代表哑口无言。为了帮助瘾君子戒除烟瘾,唐国安向大会递交一个提议,建议大会成立一个委员会,以专门研究戒烟办法,并能提供戒烟良策,这样既能戒绝烟瘾,又不用求助于任何戒烟丸药。这项提议受到了大会的重视,得到了各国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与支持。为形成会议的最后决议,唐国安还代表中国代表团提出 4 条提案草案,得到许多代表的赞许。

在 2 月 24 日的大会上,唐国安发表了禁烟演说,这是一篇 8000 字的英文报告,演讲思维缜密,逻辑性强,语言优美。开篇便指出:“吸食鸦片是我们国家所必须面对的最紧急的道德问题 and 经济问题。”^[7]对于吸食鸦片的问题,中国要根本解决,不但要靠自己的努力,也需要得到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合作。

唐国安从吸食鸦片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入手,分析这种危害也会危及到其他各贸易国。他从吸食鸦片所产生费用的损失,到吸食者无法从事劳作的二次损失,来计算吸食鸦片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

对于你们大多数人来说,吸鸦片烟的问题是你们国家所面对的诸多问题之一,但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对我们来说,

这是我们国家所必须面对的最紧急的道德问题 and 经济问题^[8]。

当时,由于积贫积弱的清政府对鸦片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以禁鸦片为名,以征收烟膏税为实,因此,当时国际上有些国家对中国这次禁烟运动的动机表示怀疑,唐国安在演讲一开始即表示:

我希望在一开头就说清楚,我们很明白,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必须依靠我们自己,而且只有依靠我们自己才能予以解决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很大的帮助,但是最大部分仍然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努力,以拯救自己。我们的各级政府——帝国的、省的和地方的——都明白这个道理。而民众,从最高等级到最低等级的人,以我国现有教育水平所难以期望拥有的清醒头脑,坚定地怀着同样的信念。先生,我不想让你这样来看待我们:中国以软弱无力的精神状态来参加这次大会,向全世界哭诉,要求让她解脱灾难,因为中国自己既无这种道德力量,亦无这种勇气来与此灾难作斗争。我们知道,困难是巨大的。我们亦计算过将来要付出的代价,我们下定决心要摆脱这种毒害。尽管我们完全明白我们自己的责任,也不管在我国要消灭滥吸鸦片的习俗有多艰难的工作,应由我们自己,亦只有由我们自己来完成。

唐国安说,中国人民对上海万国禁烟会抱有很大的期望,在演讲中,他特别强调国际联合禁烟的重要性,认为当时中国的禁烟运动应该与国际禁烟相结合,不能闭门造车。

(我们)如果没有从这次大会,从促成这次大会的你们各国政府的行动中吸取新的勇气、新的灵感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盲目无知的了,因为毫无疑问,国际合作与行动对于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对于中国来说,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重大,这样地错综复杂,因此仅靠我们自己努力,不管我们是多么地真诚,决心多大,都是不够的,要取得完全的成功还需有其他国家的合作^[9]。

最后,唐国安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圣经》里的“爱你的邻人,如爱自己一样”,作为演说的结束语,思维缜密,逻辑性强,再加上声情并茂的语言和详实客观的数据分析,让与会的各国代表信服不已。他的这篇演说被舆论界评

为一篇有说服力的演讲,“一份杰出的、逻辑性很强的报告”^[10]。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洛克伍德(Lockwood)牧师说:“他那优雅而富激情的演讲,表达了中国对列强提出的诉求。它通过完美的英语和印刷传播,使之遍及英国和欧洲。在促使英国政府对华鸦片贸易采取限运政策上,他所做出的努力比其他人要多得多。”^[11]这篇精彩的演说,后来成为清华大学学生英文演说的范本。

四、会后积极参与禁烟事务

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的召开,给中国人以极大的鼓舞,此后全国范围的禁烟运动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吸食鸦片的陋习逐渐为人所不齿,禁烟思想逐渐成熟起来,时人不仅以撰写文章、漫画、话剧等形式呼吁禁烟,民间自发形成的禁烟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为了增强禁烟团体的说服力,许多名人士绅也参与其中,劝说瘾君子戒烟。唐国安在会议之后,除处理日常政务外,也经常性地参加民间禁烟团体,向国人宣传禁烟思想,免费发放戒烟药丸。

在天津,唐国安联合当地士绅创设振华戒烟会公司,该公司响应清政府的禁烟号召,推广美国的戒烟良药。该会在天津地区影响颇大,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为了将该会的影响发扬光大,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并且借助《申报》、《东方杂志》等媒体大肆宣传,刊登戒烟广告。从1909年3月3日《申报》的一则标题为《最妥最善戒烟捷法——振华戒烟会》的广告上便可看出大概:

本会伯伟士先生经理美国新发明特别戒烟良药,上年春间曾在新马路同济医院经德国著名大医士克礼先生屡经试验,戒脱者二三十人,今已十一阅月,毫无疾病,均称善不置,乃后先生前往天津创设振华戒烟公司,蒙民政部派有瘾职官前往试验,无不药到瘾除,大获褒嘉,至今成绩昭然。现在□于上海天妃宫桥东□一北,苏州路三十七号洋房分设振华戒烟会,蒙上海道察给示劝导,并任保证,兹德国大医士克礼先生督理一切,诊治戒者之有无病症,以保戒者意外之虞。此药服后,通行血分,解除烟积,能于三十至七十点钟中,戒除净尽,并由本会出具切实证书,且戒时不患吐泻,毫无痛苦,不安之处,与别家言过其实不同,……戒后身体立时强壮,绝无萎靡不振之象,足为一证。本会备有宽敞房屋、休枕、被褥,以及起居膳饮诸品无不精美,

戒制计分三等,听戒者自择。戒愿者请先至本会报名,另有详细章程送阅,倘有怀疑,请到本会查明,前经戒脱者姓名可以就近访察,以资考证,有志戒烟者勿失之交臂也,一俟将来成效大著,再行设法推广,施治贫乏,以广善举焉。董事辜鸿鸣、祝兰舫、唐国安、朱葆三、陈可良、黄文南、金琴孙、邓鸣谦、王瑞芝、黄叔平。总医生克礼,经理伯达^[12]。

从广告的末尾可以看出,在时任外务部储才馆学员、外务部储才学堂督办的唐国安的影响和号召下,上海振华戒烟会容纳了诸多名人为董事,其中,有闻名国内外的文人,有沪上大名鼎鼎的工商界成功人士。这种各界名人的强强联合,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相当的号召力。在清廷的禁烟政策中,要求民间瘾君子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将烟瘾戒禁全无,迫使瘾君子戒吸。与此同时,以社会名流担保的戒烟会研制出有效可信的戒烟药丸,促使更多的瘾君子以吸戒烟药丸为戒烟手段,尝试着断禁烟瘾。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此种戒烟药丸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禁吸的进程,戒吸人数随之不断增多。

唐国安在禁烟方面的努力得到了国人和政府的一致认可。他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还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和禁烟知识,并且与从事世界禁毒的领袖人物勃伦脱关系密切。1911年12月初,他接受清政府的委派,作为中国代表出席海牙万国禁烟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不辱使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唐国安等代表的努力下,大会通过了有利于中国禁烟的五条禁烟章程。在章程中规定,各国不能任意向中国贩运鸦片等毒品,并保证在中国属地内配合清廷禁烟,同时也明确了中国应当承担的义务。这些条款的规定都有利于中国禁烟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彻底禁烟提供了法律依据,为中国铲除烟患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唐国安以其渊博的知识致力于禁烟事业,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民间,晚年虽为政府官员,却少有官气。他一贯忠于职守,工作严谨,思想开明,待人诚恳。在两次国际禁烟会议上他不辱使命,据理力争,在禁烟方面为中国赢得了声誉,在向国人宣传禁烟这一问题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2009年2月,联合国禁毒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公安部在上海隆重举行纪念万国禁烟会大会,在纪念世界禁毒百年之际,唐国安先生在禁烟方面的努力,仍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楷模。“前

车之辙,后车之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辱使命,沿着前人的足迹继续前进,将前人的光辉业绩发扬光大。

[参 考 文 献]

[1] 苏云峰:《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11—192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6年第 79期。

[2][4][5] 李国荣:《晚清国际会议档案》,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 3626 - 3627、3616、3617页。

[3] 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 206页。

[6] 苏智良、刘效红:《全球禁毒的开端——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研究》,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 77页。

[7][8][9] 《字林西报》1909年 3月 1日。

[10] 《字林西报》,1909年 3月 2日。

[11] 转引自唐绍明:《恰逢百年 再话唐国安与万国禁烟会》,中国网 2009年 2月 27日。

[12] 《申报》,1909年 3月 3日。

Tang Guo-an: the Forerunner of Chinese Drug Control

SU Zhi-liang¹ LU Xiao-hong²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Key Words: Tang Guo-an; International Opium Conference; opium drug control

Abstract: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Opium conference, held in Shanghai in 1909, wa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drug control conference 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the world. It affirm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drugs such as opium should be forbidden in the world.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conference were adopted by Hague International Opium Convention and accepted a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anti-drug campaign. As a member of the Qing government delegation attending the conference, Tang Guo-an prepared the meeting with other representatives and made great efforts on choosing the site of the conference, checking out the condition of opium control before the meeting. During the conference, he was well-reputed for discussing with the representative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giving excellent speech based on opium forbidding achievement in China. After the meeting, Tang Guo-an devoted himself into the work of opium forbidding and encouraged the spreading of anti-opium spirit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ti-opium campaign of the nation.

[责任编辑:周 棉]